

大学生就业指导 创新研究

Study on the Innovation of Career/Employment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李 燕 邵 林 王志军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就业指导 创新研究



李 燕 邵 林 王志军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就业指导创新研究 / 李燕, 邵林, 王志军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308-11665-7

I. ①大… II. ①李… ②邵… ③王… III. ①大学生
—职业选择 IV. ①G647.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7821 号

大学生就业指导创新研究

李 燕 邵 林 王志军 著

责任编辑 张颖琪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28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665-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社会变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挑战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思路	14
第三节 就业指导概述	20
第二章 就业指导的历史演化及其理论述评	29
第一节 国外高校就业指导的历史演化	29
第二节 中国高校就业指导的历史发展	44
第三节 著名就业指导理论述评	48
第三章 国外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的发展借鉴	56
第一节 学校就业指导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56
第二节 社会就业指导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71
第四章 大学生就业指导创新的基本理论与理念	89
第一节 就业指导创新的基本理论	89
第二节 就业指导创新的基本理念	106
第五章 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组织重构	118
第一节 组织理论与组织结构类型	118
第二节 高校就业指导组织结构的特点与功能	131
第三节 高校就业指导组织重构的原则和基本走向	145

第六章 大学生就业指导创新战略实施	153
第一节 就业指导创新模块化实施	153
第二节 “专业型”创业教育实施	167
主要参考文献	185
索 引	195
术语索引	195
人名索引	197
后 记	198

表 目 录

表 1-1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数量、比例情况	7
表 6-1	“专业型”创业的类型分析	179

图 目 录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	19
图 2-1	霍兰德职业兴趣六边形	51
图 5-1	事业部组织结构	129
图 5-2	佐治亚大学就业指导服务组织结构	133
图 5-3	法国大学生就业指导组织管理结构	137
图 5-4	浙江工业大学学生就业指导管理组织结构	142
图 6-1	就业指导组织模块化战略框架	163
图 6-2	高校就业指导矩阵式组织结构	164
图 6-3	大学生创业选型模型	178

第一章 导 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就业政策的不断调整 and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大学生能否顺利就业,不仅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针对目前高等教育就业指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创新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社会变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挑战

一、社会变迁

就业指导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和进步都不断地向就业指导提出新的要求,并产生新的教育理念。任何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组织机构和教育形式的出现都反映着社会的进步,深深地印刻着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烙印。20 世纪初,就业指导在西方的确立是机器大工业发展的产物,终身教育作为一种新的就业指导理念又是现代社会不断膨胀与加速发展的结果。就业指导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不同程度地折射着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都能在就业教育组织和指导模式的革新上找到痕迹。

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是指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生成变化过程(宣勇, 2005: 10)。在社会变迁与教育变革的关系问题上,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的变动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而社会结构的变迁又导致教育的变革,最终导致就业

指导的改变。因此,社会变迁是就业指导变革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胡宗仁,2004:19)。社会结构是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这个大系统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若干子系统。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各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内任何一个要素的变革,都要求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做出不同程度的调整或变革。因此,社会变迁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对教育产生影响,且最终导致就业指导的变迁(吴康宁,1998:155),因而,探讨社会变迁对教育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影响就业指导变革的最深层次因素。吴康宁认为,社会变迁主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实现对教育的影响作用。

1. 政治变迁对教育变革的影响

实际上,政治因素对教育中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组织制度、目标和内容等方面。在教育政策层面上,由于利益集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不仅通过教育的领导权、受教育权、教育财政的划拨比例与份额等方面制约着教育政策的制定与维护,而且在尽可能保持政策稳定性的同时,为了防止教育政策的某种变革而将教育变成一个难以变革的领域。在教育组织制度层面上,现今通行的官僚制(bureaucracy)总是把严格的规范要求强加于学校,使得学校成为结构臃肿、效率低下的机构。在内容上,教育者借助学校的显性和隐形课程教育,向学生传递有关爱国主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相关的价值观念,促使未来的公民具有一定方向性的政治取向。

2. 经济变迁对教育变革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变迁已日益成为左右教育的决定性和主导性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结构的调整、资源的分配、内容的演化以及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首先,经济的、产业的结构变迁决定着教育结构的变迁。贝尔(Daniel Bell)^①曾以产业结构的变迁推演出人类社会的三种基本经济形态,而这三种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结构的三种基本导向:精英教育阶段、大众教育阶段

^①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其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的终结》和《今日资本主义》等,都极其深刻地剖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并提出了对未来的一些预测。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技术已经成为变革的一种主要力量。

和普及教育阶段^①。随着经济中心原则在社会主导地位的增强,教育在其结构形态和制度设计上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附应也就愈加凸显。其次,经济中心原则还决定着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和运作方式。通过教育市场化重建,把财政、人员调配和政策制定等权力逐步下放到各级教育机构,让个人的选择在教育市场中具有最大机会,同时促使学校教育为教育消费者提供最佳的服务。再次,经济发展的要求决定着教育内容的变迁,主要表现在整合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分离的种种努力上。最后,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教育科层化的基本趋势。鲍尔斯(Samuel Bowles)^②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的学校教育改革运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反映,教育实际上承担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责。

3. 文化变迁对教育变革的影响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对教育活动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作为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对教育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教育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对文化的变迁和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教育的传递、储存、选择、整理、创造和发展文化等多种功能上。其中,传递文化是教育的主要功能。通过教育,可以把人类积累的文化精华传递给青年一代,使社会得以生存和延续,使个人得以成长和发展。大学教育以文化的最高成就作为其活动的基础,而大学教育对文化的反作用,突出地体现在选择和整理文化、创造和发展文化等方面(蒋嵘涛,2004:91)。

4. 意识形态的变迁对教育变革的影响

以往的所谓精英教育、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在制度形式上都充满着意识形

①1973年美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根据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达到的标准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精英教育阶段、大众教育阶段及普及教育阶段,三个阶段所对应的毛入学率分别为:15%以下、15%~50%、50%以上。大众化是揭示高等教育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因而,大众化理论就是提醒我们做好应对变化准备的一种预警理论。

②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美国社会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在1976年两人合著、出版了《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们采用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强调教育对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起的作用,认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阶级矛盾关系的反映,指出学校教育的社会化职能不仅在于使未来劳动者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习得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个性品质。

态的意味,凸显了教育制度设计的合法性、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变迁和冲突,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问题。教育意识形态的变迁又决定着教育制度形式的变革,即意味着教育由专制趋向民主、由中央集权趋向地方分权、由政府趋向市场。民主、分权和市场不仅是制度形式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些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得学校教育制度形式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对此,学校社会论认为,学校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些内在和外在的群体组成,这些群体主要是中央政府或利益集团按照一些旨在改变学校运作计划的策略来投资的,也即是政府、利益团体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决定着学校教学大纲、教学实践和成就规范的演变。

社会变迁对作为高等教育的有机成分之一——就业指导的影响作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尤为凸显。按照职业社会学观点,就业指导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社会变迁必然导致就业指导的变革。就业指导也只有变革、积极适应各种社会变迁,才不至于被社会所排斥和淘汰。因而,社会变迁必然引起高等教育的变革并带来就业指导组织结构的变革和重新创设与选择。大学也只有进行包括就业指导在内的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创设,才能反映社会变迁、适应社会变迁,最终才能肩负起大学所承担的使命,充分实现教育的价值。

自从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就业指导理念和方法引入中国以来,就业指导的发展都与社会变迁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1976年至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些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下而几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体制上,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就业指导体系具有指令性、计划性、大一统、趋同性等特征,这样的就业指导结构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化的就业要求。因此,经济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对现有大学就业指导进行变革与创设。因而,加强就业指导变革与创设的研究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其次,从政治体制看。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作保障。建立在传统政治体制上的就业指导组织体系由于行政性、命令性等特征比较明显,就业指导组织本应具有的人本性和专业性等特性相对缺乏,最终导致就业指导过程中的行政权力泛化以及形式化。因此,改革具有行政性质的就业指导组织结构,建构体现人本组织特性的就业指导体系,是当前乃至今后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

第三,科技革命与科技进步也对就业指导的变革与创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美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①测算,人类拥有的知识量在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一倍,进入20世纪,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每5年增加一倍,目前大约是每3年增加一倍。知识总量的激增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必然带来就业指导方式的变革,只有变革就业指导体系,才有利于发挥大学的功能,促进个人的社会发展,最终促进科技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

最后,在信息化社会中,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通信手段的现代化,促成了数字化校园的产生,带来了就业指导手段和方式的变革。原来建立在真实世界基础上的就业指导难以适应网络技术下虚拟世界所要求的教育活动方式,探索和建立数字化就业指导或在就业指导中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就成为新时期高校就业指导变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科技革命与科技进步必然带来大学及其就业指导的变革。

总之,中国社会无论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还是从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转变以及科技革命与科技进步,均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教育观念,改变着我们的教育制度,改变着我们就业指导的理念与模式。在这社会变迁中,大学生就业指导如何建构,如何选择,建构的路何去何从,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它的解决,对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与育人功能的发挥,以及对社会变迁的导向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指的是高等教育规模变化过程中量的增长标准及其所引发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质的变化两方面的内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与其经济环境、外部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讲,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物,脱离了市场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就很难完全实现,对此,整个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实践给予了有力的证明。美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进行的,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其整个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邹大光:2002:57-58)。正是得益于高等教育外部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市场经济与

^①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牛津大学计算机专业教授、博士,美国著名的管理和信息技术专家,其著述甚丰。文中数据引自他的《生存之路——计算机技术引发的全新经营革命》(李东贤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一书。

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才顺利地进入“后大众化”时代。而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未像美国、日本那样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高等教育被看成是“义务教育”和社会福利,因此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财政投入和责任。这些财政投入和政府责任形成一道防护带将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隔离开来,市场力量难以深入高等教育。因此,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欧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一些国家出现了高等教育增长的徘徊期,甚至是负增长。美国和欧洲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模式表明,针对市场经济环境下做出的不同的高等教育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将会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体制将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在这种市场经济环境下启动和发展的。因为高等教育与欠发达的市场经济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不仅表现为大众化的启动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且在实施过程中也以公办高等教育系统为主体,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缺乏市场的力量。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外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环境之间近乎隔绝的关系中,我们可以预见,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有可能出现像欧洲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那样的停滞期,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国高等教育自 1999 年大幅扩招并由此步入大众化之路以来,至今已走过十余年的历程。在此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在实现大众化的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步探索出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路径,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大众对高等教育的基本需求,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依据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高等教育工作重心转移的具体情况,大众化的进程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提速扩张阶段、调整结构阶段以及提高质量阶段(王胜今、赵俊芳,2009:26-27)。

1. 提速扩张阶段(1999—2000 年)

从 1998 年底教育部制定《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到 1999 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要扩大现有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的招生规模,直至后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都为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奠定了政策与思想基础,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历史进程。1999 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为 159.68 万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招生数量最多、增幅最大、发展最快的一年。

2. 调整结构阶段(2001—2005 年)

针对这一期间存在的教育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在保持一定增长幅度的同时,开始注重对高等教育的结构进行调整,主要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等进行调整,尤其是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市场变化的趋势,加快了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这一时期的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得到了初步改善,1998、1999、2000 三年普通高校本科院校数量与普通高校总数的比例保持在 56%以上,之后,普通专科院校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见表 1-1)。入学人数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如 2003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 17%,2005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 230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1%。

表 1-1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数量、比例情况

年 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普通本专科院校总数		1022	1071	1041	1225	1396	1552	1731	1792	1867	1908
普通本科 院校	数量(所)	600	597	599	597	629	644	684	701	720	740
	占总数比	59%	56%	58%	49%	45%	41%	40%	39%	39%	39%
普通专科 院校	数量(所)	422	474	442	628	767	908	1047	1091	1147	1168
	占总数比	41%	44%	42%	51%	55%	59%	60%	61%	61%	61%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8—2007)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

3. 提高质量阶段(2006 年至今)

2006 年,国务院、教育部先后指示,要放缓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要将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自此,我国高等教育进入稳定规模、注重提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其后,中央各部委共 14 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2006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从政府投入层面来控制高等学校招生数量与增长幅度,稳定招生规模。2007 年,教育部进一步明确强调各高校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完善本科专业设置,进一步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211 工程”、“985 二期工程”以及“2011 计划”都是政府力促高等教育质量的三个主要途径。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从“提速扩张”、“结构调整”以及“注重提高教育质

量”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思路更加理性，战略决策更加科学。毫无疑问，从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的扩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对此，宋长春(2005：109)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良性互动关系。综观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社会经济愈发展，愈需要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其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工业经济时代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已十分密切，知识经济时代这种互动将更加突出。

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人的自身发展存在着相互吸引的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价值，而教育大众化也使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满足。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①的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的增长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拥有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适应生产力要求的人才资源，而这必须通过大量的教育投资才能实现。美国在1929—1952年间的经济增长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期间美国教育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自身发展的巨大作用和意义。追求教育民主化、教育机会平等的要求越来越强，接受高等教育成了人们的强烈需求。

三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传统的教学与科研职能将延伸至直接介入工业生产和其他社会组织，并直接为多数公众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调整。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变和调整，迫切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持，尤其是以高科技为主导的产业，更加需要高等教育为其源源不断地培养各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而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利用扩招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出现了偏离科学教育方向的不和谐现象。对此，纪宝成认为高等教育存在“三个

^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1902—1996)，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1960年就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保健和人口流动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这一理论观点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通常把舒尔茨称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父。参考：张佩云主编，《人力资源管理》(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跟不上”(2006: 3)。所谓三个跟不上,一是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跟不上招生规模的发展速度,政府拨款占高校经费的比例低于50%(2006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二是教师队伍建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进程,表现为教师数量增长跟不上高等教育快速增长的需求;三是办学理念、制度建设乃至社会心理跟不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进程。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建设,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观念、功能、学校类型、定位、教学内容、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管理方式等的全方位变革。不仅如此,高等教育大众化也需要相应的就业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创新。

高等教育大众化实际上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只有全社会逐步树立起与大众化高等教育相适应的新的择业观、就业观,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有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功能有了正确的认识、理解和预期,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才会持续健康地发展。没有大众化的就业观念和就业制度,就不会有持续健康发展的大众化高等教育。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和特征

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在2002年至2007年的人数分别是133.73万人、187.75万人、239.12万人、306.80万人、377.47万人、447.79万人,六年间毕业生人数增长率一直处于20%左右;在2008年至2013年的人数分别为559万、610万、631万、660万、680万、699万。

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轨,其就业问题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1. 高校毕业生由“精英就业”向“大众化就业”转变

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的是治国精英和学术精英,并赋予他们职业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精英教育相匹配的就业制度是“统包统分”的分配制度。我国过去长期对毕业生就业实行在国家统分体制下的精英岗位就业,大学毕业生与“国家干部”基本可以画等号。而在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的目标转向满足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和学生的个人要求,大学生就业也从精英就业转向大众化就业、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天之骄子”变为普通老百姓,就业从原来的“统包统分”变为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在这种大众化就业形势下,有的毕业生通过竞争进入社会的精英岗位,有的则从事与大众化相适应的工作。这种现象会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中所能提供的岗位有限而越演越烈。

2. 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开始由“卖方”转向“买方”

精英教育阶段,由于高等学校毕业生供给小于社会需求,毕业生处于“卖方市场”。在计划分配的就业时期,这种精英式的就业表现得相当明显,政府将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按照“国家干部”的身份,分配到各个高级技术、高层次管理等专门的或专业的岗位上。而当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高校毕业生则出现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毕业生处于“买方市场”。社会提供的“精英”岗位在这段时期是非常有限的,毕业生内部也出现明显的分化,在毕业生就业市场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校际之间、不同学历之间、不同个体之间的竞争。再加上由于一些高校缺乏清晰的办学层次定位,以致办学没有自己的特色,缺乏多样性,培养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也就缺乏竞争力,直接导致很多毕业生无法在社会“大众化”岗位上就业。因此,高校毕业生就业从学校工作的边沿走向中心,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中心内容。

3.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构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走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

第三产业^①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一般达到60%~75%。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及城镇化的演进过程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必将大幅度增加。高校毕业生大量进入第三产业领域就业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显著特征,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吸纳大批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及专业水平的人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构也将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走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只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学科结构和专业结构,才能满足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人才需求。

4.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式由单一性向多样化发展

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步入大众化阶段,除了数量的变化,还包括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要求等内容的质的变化。大众化阶段要求高等教育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培养目标的多样化必然导致毕业生就业取向、就业形式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既体现在对多样就业地域要求层面,也体现在对就业单位属性、就业途径、就业方式、就业标准以及就业管

^①第三产业,又称第三次产业,是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于1935年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它是指除农业、工业、建筑业以外的其他各业。不仅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还可以扩大就业领域和就业人数,从而保证社会安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参考:薛荣久、张汉林著,《国际服务贸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理的多样化选择等层面。就业形式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就业观念也应随之发生转变,因此必须树立现代的就业观。从目前来看,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已由就业教育转向创业教育,而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正确看待大学生“就业难”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大学生就业难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如果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的模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时,即使不扩大招生规模,也会出现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因此,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就业压力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中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转型。中国在这一转型期内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就是人口就业,主要表现为: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就业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之一;经济转型的艰巨性决定了中国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好历史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将长期面临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和城镇转移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加快决定了中国将长期面临调整劳动力结构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挑战。上述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就业问题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存在,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劳动力就业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这种在转型中所出现的就业不适症状在未来可预见的几十年内还将持续下去。

一定的经济增长在不同的经济体和不同历史时期所带来的就业效应会有所不同,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高就业弹性阶段,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这种拉动作用逐步减小,就业弹性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就不难理解,虽然我国经济近十年虽然一直保持着 8% 以上的持续快速增长势头,但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间还比较短,社会整体就业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在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由于企业改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使得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二是城镇新增劳动力增幅较大;三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向城市转移的规模、速度加快。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仍将同时并存,使我国的整体就业环境形